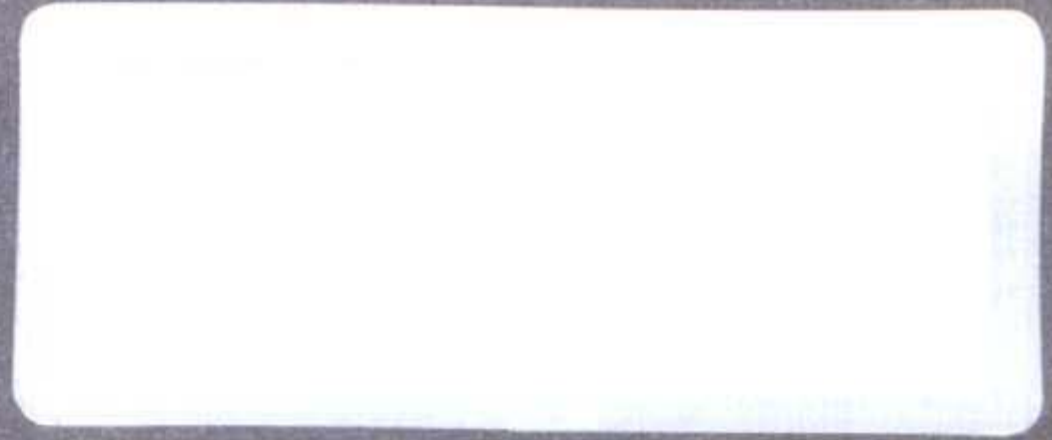


B84-06

61

一个伟大的精神分
析学家对当代社会中个
人困境的杰出而彻底的
追寻



未发现的自我

C·G·容格 著

张增武 阎广林 译



·英文版出版前言·

容格博士在这本分析透彻、论述清晰的著作中，提取了他毕生的经验，并且肯定地认为，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意识和无意识这两大领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文明的前景如何，完全取决于这种鸿沟的消除。

在向我们发出严重警告并且提出了长久的医治办法之后，这本令人兴奋的著作还指出，当人类不再遭受自然灾害和世界性的流行病的困扰之时，他就会被存在于自身之中的心理变化置于非常严峻的危险之中。只有当个人理解了他自己本质之中的二重性——一个人既可能走向罪恶，也可能走向善良——的时候，他才能够开始理解并且应付潜伏在权力之中的上述这些危险。

卡尔·古斯塔夫·容格 (CARL GUSTAV JUNG) 同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一起，并称为当代精神分析学的三大先驱。容格于1865年生于瑞典，在那里，他学习了医学和精神病学，嗣后成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早期支持者与合作者。但是天长日久，这两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之间那严重的理论分歧 (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不同，容格建立了人的宗教本能的理论)，最终导致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个人交往方面的分裂。容格博士毕生著述甚丰，多年以来，他一直在 his 家乡苏黎世生活和工作。

· 目 录 ·

1. 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困境	1
2. 宗教，群众观念的补充	18
3. 西方人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	32
4. 个人对自己的理解	44
5. 走向生活的哲学与心理学	73
6. 自知	91
7. 自知的意义	109

·第一章·

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困境

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古往今来，世世代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头脑和心灵，尽管这种困扰的程度，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当人们陷入困境，尤其是当人们在物质上、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他们便怀着焦虑的心情，把希望的眼光投向未来，并且变本加厉地期待着天启空想（apocalyptic visions）和乌托邦观念。例如，只要想象一下纪元之初奥古斯都时代的

千年至福期待 (chiliastic expectation) ①, 或者想象一下在人类的第一个千年盛世结束之际西方人的精神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上述情况便会昭然若揭。今天, 由于人类的第二个千年盛世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 我们重新又生活在一个到处弥漫着各种天启意象的时代里, 这些天启意象纷纷预示着宇宙的毁灭行将来临。那种以“铁幕” (Iron Curtain) ②为标志而将人类分成两大阵营的分裂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氢弹开始爆炸, 或者说如果国家极端主义 (State absolutism) 的精神黑影和道德黑影笼罩了整个欧州, 我们的文明, 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前景将会如何呢?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这种恐惧淡然处之, 掉以轻心。在现在西方的每一寸土地上, 到处都有一些专门从事颠覆暴动的少数人存在, 这些人在我们的人道主义和我们的正义感的庇护之下, 煽风点

① “千年至福”是一种宗教幻想, 它的意思是, 世界末日后将会由复活的耶稣再来统治世界一千年。见《圣经·启示录》第20章、第1—5小节。

——译者

② 五六十年代, 西方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及当时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用语。

——译者

火，蛊惑人心，而且只有当广大群众结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相当理智的、在精神上十分巩固的社会基础之时，才可以对这些少数人形成限制，除此严格的条件之外，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的思想泛滥，传播四方。不过，我们切切不可过高地估计这种社会基础。因为，由于各个民族的民族气质有所不同，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础也就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在某些地区，这个社会基础还与公民的教育息息相通，密切相关，并且它还深受某种令人十分不安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就拿公民投票来说吧，人们可以乐观地把某次投票中投赞成票的选民比例估计到40%左右。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还可能会有另一种更为悲观的估计，因为推理的才能和批评性的思考并不是人类的突出而显著的特征，而且即使这种特征在人类之中突出而显著，事实证明，它也是摇摆不定的，甚至作为一种规律使我们看到，政治集团愈是庞大，这个特征就愈是摇摆不定。其实，群众常常会把可能存在于个人身上的独特眼光和独到见解消磨殆尽，这样一来，如果有朝一日，国家政体变得软弱不堪，那么便必然会导致教条主义者和专制独裁的诞生。

只有当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情绪没有超过某种

严格的限定之时，理论的讨论才可能进行，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情感的激烈程度高于这个水准，理性便很可能丧失一切功能，而且还可能会被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一种集体所有权（collective possession）就会应运而生，而这种集体所有权很快地便会发展成为一种精神流行病（psychic epidemic）。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不合社会性的缘故而仅仅只能为理性法则所容忍的那些因素，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象这样的人，在现在的监狱里和疯人院里比比皆是，根本不足为怪。据我估计，在每一种精神病现象之中，至少包含有十个潜在的病例，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潜在的病情一般很少公开爆发，但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不由自主地要受到病态因素的影响。当然，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关于潜在的精神病的发病率，我们现在还没有科学的医学统计。然而，即使这个数字尚未达到精神病现象与犯罪现象的十倍，它们所代表的微不足道的人数比例，也会因为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所具有的特别严重的危险性而得到更多的补偿。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属于集体冲动型（collectively excited），深受情感判断和泛泛空想的支配。在“集体所有”的情况之下，他们随方则方，遇圆则圆，经常凭借

集体所有权的庇护，闲适自如、游刃有余于社会环境之中。他们依靠自己的经验，掌握了这种环境的语言，并且逐渐懂得如何支配这种社会环境。而且，通过那些由盲目的怨恨所维系的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深受集体非理性（collective irrationality）的欢迎，并且在不切实际的空想那里找到了自己滋生的土壤，因为这些空想表达了潜伏在那些貌似理智与睿智的正常人心灵深处的一切动机和一切怨恨。因此，尽管与社会总人数相比，这些潜在的精神病人为数寥寥无几，但是他们显然却成为十分危险的传染病病源，因为所谓正常人的自知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时下的大多数人，一般都把“自知”（self-knowledge）与他们自身那自主自觉的个性（conscious ego Personalities）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任何一个完全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以为他理所当然地了解自己，然而，自我有其本身的内涵，它与无意识及其含义风马牛不相及。人们通常总是习惯于按照社会环境中一般人了解自己的尺度，而不是按照大多隐藏在他们之外的精神事实来衡量他们的自知能力。在这一方面，一般人对于诸如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组织结构这些精神行为了解甚少。尽管人们生活在这种结构之中，并与之朝夕相处，但

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却对此盲然无知，如若路人，所以，现在就需要用专门的科学知识来介绍意识与人所周知的关于人体的知识的关系，尤其需要介绍意识与那些虽然目前鲜为人知，但却依然存在的知识的关系。

由此可见，人们通常所谓的“自知”，实际上是一种局限性非常大的知识，其中的绝大部分性质，都是由仍然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之中的各种社会因素来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才会顽固地存在着一种偏见，总是认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不会“落在我们头上”，不会发生在“我们家里”，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亲朋好友或相识之中；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又会在无意之中遇到各种与这种偏见相左的虚无飘渺的假想，这些假想只能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掩盖起来。

在无意识——这里的无意识不受意识批评和意识控制的影响——的广阔天地里，我们形影相吊，孤立无援，很容易接受各种影响，很容易染上精神传染病（*Psychic infections*）。在各种危险的情况下，只有当我们清醒地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向我们迎头袭来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清醒地知道这个危害物来自何处、何时将临吾身的时候，我们才能

够抵御之。与此相同，只有提前做好了精神准备，我们才能抵御这种精神传染病。由于自知是一个企图了解个体事实的问题，所以理论在这一领域内毫无用武之地，因此我们看到，理论愈是强调自己的普遍有效性，它对这些个体事实作出解释的准确性就愈差。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都必然是统计性的（statistical），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总是提出一种观念上的平均价（ideal average），而这个平均值又总是将天平两端的所有例外平衡下去，并且用一个抽象的平均数取而代之，虽然在现实世界里，这个抽象的平均数不一定就非存在不可，但是它在理论上却是相当有效的，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在一切理论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尽管两个极端上的那些例外都同样有事实的根据，但是，这些例外根本不可能以最终结果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抵消掉了。例如，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一堆鹅卵石中每块石头的重量，并且已经求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145克，那么，我也很难说清楚这些鹅卵石的实际重量。在此基础上，任何一个认为他第一次就能捡起一块145克的鹅卵石的人，结果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的。其实，实际上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论他寻找多久，他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一个正好是145克的鹅卵石来。

所谓统计方法，就是从观念平均值的观点出发来说明客观事实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能给我们描述那些凭经验所得到的客观事实的真实情况。当我们对现实中的某个无可争辩的方面进行思考的时候，统计方法往往会以最容易使人误解的方式来虚构实际的真理，以统计为基础的理论尤其是如此。但是，在实际情况中鉴别事物、区别事物是它们共同的特点。而且，如果要给实际情况下一个不太精确的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说，实际情况只不过是各种例外所构成的一种情况而已，因此，绝对的真实首先具有不规则的特点。

一旦谈到某种理论对于自知的指导意义时，我们必须牢记以上各项要点。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以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自知，因为自知的对象是一个个人——一种相对的例外和一个不规则的现象。所以说，赋予个人特点的并不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而是为个人所独有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个人理解成为一个周期性出现的单元（recurrent unit），而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既单一又独特的存在，而且经过分析，我们最后可以发现，个人既不可知，又不可能与其它的任何事物进行比较。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员，他可以被当作，也必须被当作一

个统计单元来看待，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人类进行一般的理论概述了。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人作为一个比较单元，与其它事物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普遍的行之有效的人类学和心理学，而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平均单元，人也就有了一幅抽象的肖像，显然在此抽象过程之中，个体的一切特征都消失殆尽了。然而，正是个人的这些特征，才对我们了解人类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打算了解一个具体的人，那么，就必须把关于一般人的科学知识置之度外，并且还要抛弃所有的理论概念，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我们采取一种全新的、毫无偏见的态度去进行理解。我只能去理解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心灵，而要理解人，抑或说要洞察人的特点，那么就必须具备关于人的各种基本知识。

现在，不管是了解一个具体的个人，还是了解自知，我都要把所有一切的理论设想弃之脑后于不顾。由于科学知识不仅奉行普遍尊重的原则，而且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它还被当作无与伦比的知识权威和精神权威，所以在理解具体的个人时，我们就不得不大逆不道了，也就是说，只好对科学知识视而不见。其实，这也是一种并非轻而易举的牺牲，因为科学态度难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使它自己摆

脱责任感。而且，倘若心理学家恰巧是位医生，他不但要对他的病人进行科学分类，而且还要把自己的病人当作一个人来理解，那么他就会为工作中所出现的一种强烈的冲突所威慑住，这种冲突就是：一方面科学知识与人的知识这两种知识态度完全对立、互相排斥，而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理解他的病人。实际上，这种冲突不可能通过任选其一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一种双向思维——即在思维过程中彼此兼顾——的方法来解决。

大体上说来，人类知识所具有的积极优势，其目的尤其在于弥补他们理解能力方面的明显不足，就这样的事实而论，由人类知识而产生的判断便成了某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概念。其实，在科学的判断中，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总是在永无休止地重复自己的个体而已，而且还可以用字母表中的任何一个字母来命名这个个人。但是另一方面，在理解的过程中，个人则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性存在，这种个人在被剥夺了那些使科学家非常倾心的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时候，就完全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体存在和唯一真实的研究对象。最为重要的是，医生将会意识到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他具备科学训练所赋予他的统计真理 (statistical truth)；另一方面，他又面临着治疗病人、尤其是治疗精神

病人的任务，而所有这些病人都十分需要个人的理解。所以，治疗越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进行，在病人身上所引起的抗拒心理就越强，而且治疗的效果也就越危险。精神病治疗专家发现，不管他们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要熟练地把病人的个性当作人的一种基本事实来对待，并且依此来安排他的治疗方法。现在，在整个医学领域里，人们已经承认，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治疗一个病人，而不是治疗一种抽象的疾病。

上面谈到的这些关于医学方面的情况，仅仅是一般的教育问题和教养问题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科学教育主要是以统计真理和抽象知识为基础的，因而它给世界描绘的是一幅非现实的理性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仅仅作为一种边缘现象(marginal phenomenon)的个人，没有起任何作用，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不过，作为一种非理性存在的个人，却是客观现实的真实而可靠的载体，是许多科学论述所涉及到的那种与非真实性的理念或者正常人相对立的具体的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绝大多数自然科学，也都在设法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预，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作用是可以

置之度外的（在这一方面，现代物理学是个例外，它承认被观察到的客体并不能脱离观察者的主体而独立存在）。因此，科学也给世界描绘了一幅图画，在这幅图画里，真实存在着的人的精神似乎是被排除在外的。其实，这完全是对“人性”的货真价实的反对。

在科学假设的影响之下，不但人的精神，而且每一个个人，甚至一切个体存在，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他们统统都贬值了，统统被混淆得模糊不清了，以致于使得现实的图画被扭曲成了一个概念化的平均值。我们不应当过低地估计统计性的世界画面所具有的那种心理效果：它使得一些无足轻重的因素取代了个人的位置，并且把这些因素堆砌起来，形成群众组织。科学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具体的个人，与之相反，而是各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并且在最高的层次上，科学给我们提供的是，作为政治现实原则的国家这个抽象的观念。如此以来，个人的道德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政策（raison d'état）所代替了。于是，你便失去了个人道德和个人精神的特殊性，而只是津津乐道于公共福利的获得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这些老生常谈。于是，个人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这是唯一真实的生活）便不再存在于个性的发展之中，而是存在于国家的政策之中，这种国

家政策从外部而来，强加在个人头上，旨在实现一种最终目的是要把一切生活都吸引到自己身边的抽象观念。于是，个人便被一步一步地剥夺了诸如他自己应该怎样生活的这种做出道德选择的权力，与此恰恰相反，他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被统治着，被供养着，被别人穿上衣服，接受别人的教育，并且被别人安排在一套单元住房里，按照那些给群众提供乐趣、提供满足的标准而获得自己的娱乐。至于统治者，他们和被统治者一样，都是社会的构成单元，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国家原则 (state doctrine) 的特别发言人。因此，他们无需成为能够作出判断的人物，而是一旦离开了他们的职业范围就完全陷于无用无能之中的彻头彻尾的专门家，因为他们应当教什么、学什么，都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

至于表面上看来是全智全能的国家原则，它的目的则是要通过那些在政府部门占据最高地位的人们，以国家政策的名誉来对政府进行管理。在这里，一切权力都集中了起来。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通过选举，抑或是通过偶然的机遇，只要他身居高位，那么他就不再卑躬屈膝于世间的任何权威了，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国家政策的化身，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来